



大象出版社



凤凰卫视 百年政论

1900-2000

世纪末的追问

TRACE THE LAST CENTURY

欧阳江河
雷格
贺照田
史树国
孔庆东



凤凰卫视 百年政论

1900-2000

世纪末的追问

TRACE THE LAST CENTURY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00—2000：世纪末的追问 / 欧阳江河等著. — 郑州：
大象出版社，2000.12
ISBN 7-5347-2498-8

I . — … II . 程 … III . 评论 -1900-2000 - 普及读物
VI . 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7027 号

策 划 程鹤麟 欧阳江河
文 字 欧阳江河 雷 格 贺照田 史树国 孔庆东
图 片 赵 章
责任编辑 何 力
责任校对 霍红琴 王 森
书籍设计 张 帆
出版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 行 大象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0371—5726194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版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7.5
印 数 1—2 000 册
定 价 14.60 元

关于本书的若干说明（代序）

程鹤麟

1

世纪之交，人们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是，21世纪究竟应该从2000年算起，还是应该从2001年算起。争论的双方最后谁也没能说服谁。这时盘旋在我头脑里的一个古怪的念头是，好在人类不是那只蜈蚣，否则我们会在问题没有讨论清楚之前，全体停在1999年的12月31日，不能动弹。“那只蜈蚣”是一则寓言里的主角，由于被一只好奇的蚂蚱之类的昆虫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而陷入困境。那厮见蜈蚣长着数不清的那么多条腿，就煞有介事地问蜈蚣：“当你的左边第一条腿移动时，右边第一条腿在干什么？左边第二条腿在干什么？右边第二条腿在干什么？左边第三条腿……”蜈蚣被这个庞大复杂的问题难住了，它停下脚步仔细地想了想，突然就僵在原地走不动了。

好在人类不是那只蜈蚣，不管哪年哪月才算21世纪，日子还是照样过着，历史的车轮继续地前进着。而且人类也不怕庞大复杂的问题，1999年底，各路英雄豪杰志士仁人都忙着回顾刚刚过去的一百年里，人类的左边第一条腿移动时，右边第一条腿在干什么，左边第二条腿在干什么，右边第二条腿在干什么，左边第三条腿……中国人谓之曰：世纪盘点。

在这场席卷全球的大盘点中，凤凰卫视这位审计师用了自己的方法，延请五位精壮的小伙子倾力扛鼎，清算20世纪的是非悲喜。这五位小伙子硬是不错，仅用了半个月时间，就每人拿出了一篇洋洋万多言的皇皇大作，分别用伊妹儿发给我，个个还都遵守了起先的诺言，同意让我这个凤凰卫视的制片人按剪辑的需要任意修改他们的文字。年底，凤凰卫视播出了一部政论片——《一百年的追问》，共5集，每集1小时。节目播出后，立即引起学界广泛注意。精壮的撰稿人之一诗人欧阳江河几天内接到来自海内

外的几十通电话，另一位精壮的撰稿人贺照田则在他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里，频频遭遇老少学者们的祝贺。而大象出版社愿意把未经电视人修改的原稿结集成书出版。这既满足了未能看到播出的观众的需要，也使年轻的思想者们的原作得以原样问世。

于是就有了这本未经涂改的书。

2

20世纪，经纬万端，错综复杂。人类世界的“腿”不仅远远多过蜈蚣，而且步伐似乎也更加纷乱。如何理清头绪呢？写稿之前，年轻的学者们有过一次研讨，大家决定各自触及一个侧面，不及其余；并且我们还达成了一个共识：允许发表偏见。我们知道，人类不会像那只可怜的蜈蚣那样，为了得出一个真理而停住自己的脚步；世界也不会因为我们的谬误而天旋地转。我们不是世纪判官，也不是耶稣、释迦牟尼，我们只是碰巧活在了世纪之交，在这个坎节儿上，认真地做了一件自己做得到的事情。

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3

孔庆东先生论述了20世纪所具有的合作的特征。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之后，人们认识到了合作的重要性，认识到以局部利益为最高利益的时代已经过去，不照顾整体利益的局部利益将自身难保，所以富人俱乐部在科隆开会时，宣布免除穷国的债务——富国认识到：如果穷国被债务逼到根本没有消费能力的地步，则富国也就失去了市场。合作包括了人与人的合作、国与国的合作、地区与地区的合作，也包括了人与自然环境、动物、植物的合作。

雷格论述了20世纪的人类所具有的健忘的特征。20世纪人类借助工具记忆的水平发展到从未有过的极致，因此人类的记忆力在退化。遗忘当然有利于人类健康愉快没心没肺地过日子，但过快的遗忘使人类不断地重犯同样的错误。有时你会发现，对某个信息的记忆还没有形成，新的信息又冲击过来占领了你的脑空间。

这是一个对历史的态度的问题。历史不是铁板一块，但历史难道会是幻影吗？20世纪万事万物更替的速度剧快，求新求变，追求时尚成为人们共同的性格、脾气。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而今天的人们似乎把忘记当做生存的一剂麻药。

史树国先生论述了20世纪所具有的复制一切的特征。在20世纪，一个事物能否复制使更多的人共享，成为这个事物是否具有价值的标准之一；换言之，价值是由复制的潜力决定的。消费是复制，教育也是复制，按同一个模子培养人是20世纪教育的特点，因材施教成为遥远的模糊的记忆。一切都机器化，数字化，大众化，标准化。

贺照田先生论述了20世纪所具有的追求解放的特征。20世纪的“解放”，不再是单纯的文明对野蛮的解放、理性对蒙昧的解放、进步对落后的解放。20世纪有关“解放”的各种论说和运动彼此间相互冲突、交错扭结，让人眼花缭乱。就连法西斯主义也打出了“解放”的大旗，性放纵也披上了“性解放”的外衣。在20世纪，解放是时尚，是旗帜，是武器，是梦想，也是美丽的陷阱。

欧阳江河先生论述的是20世纪所具有的追求高效率的特征。在20世纪，人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在“效率”的关照下，兴奋地生活着；高效率、高速度、高发展成为评判事物品质的一般标准。生活就像是一只上了发条的橘子，现实的神经纤维被效率的发条拧了又拧，到处是时间加速度的滴答声。生活的各种碎片在读秒声中快速切换，人类生活在电视上、互联网上、洗衣机上、微波炉上。总之，生活在别处。

20世纪的人类社会又岂止这五个特征？但我们只有5小时的播出时间。这就是为什么凤凰卫视的这部政论片不是6集也不是4集的惟一原因。

其实，也不必面面俱到吧？

2000年6月3日于香港

目 录

1

关于本书的若干说明

程鹤麟

1

效率的神话

欧阳江河

21

遗忘的病症

雷 格

40

解放的困惑

贺照田

70

复制的震撼

史树国

88

合作的奢望

孔庆东

效率的神话

追求高效率、高速度、高发展，已成为当代人的一个基本共识，一种行为准则，它对20世纪人类生存现状和前景所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决定性的、无所不在的。它不仅更新了我们的时间观念、空间感受，重塑了生命和物质的定义，而且对人类的心灵状况、语言方式和精神时尚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时至今日，效率已从乏味的行政事务和经济运作升华为一个神话，速度则形成了一种品格，至于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说：“发展是一个硬道理。”

(图1)

一百年前的1900年，曾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奇迹之年”。奇迹首先是在速度上体现出来的——1900年，世界上第一辆电车出现在纽约街头，飞艇“齐柏林号”在德国首航，第一道无线电波跨越大西洋，世界之都巴黎有了第一条地铁。这一切似乎预示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方式、交往方式都将被更大的能量和推动力所驱使，以更高的效率和更快的速度在新世纪齐头并进。的确，1900年，在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尤其是在科学发明和技术应用方面，对当时的人们来说都是停下来清点存货的一个重要时刻。在进化论方面堪与达尔文相提并论的科学家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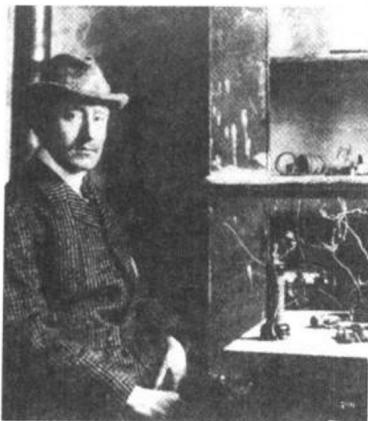


图1

1901年12月12日，格林威治正午时分，世界上第一道无线电波从英国柯尼什海岸的一座发射台发出，穿越大西洋，抵达纽芬兰岛上的圣约翰城。这是在纽芬兰接收站的物理学家马克尼，他与在柯尼什海岸发射台的电气工程师弗莱明合作，完成了无线电史上的首次长距离发射与接收。

图 2



1901年，亲手敲出世界上第一个跨洋无线电摩尔斯电码的英国电气工程师弗莱明，于1904年革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热离子真空管即二极管。他发现，经过革新的二极管有助于无线电远距离传播声音。

尔弗列德·拉萨尔·华莱士于1899年回顾了整个19世纪，将其誉为“神奇的世纪”。华莱士列举了19世纪所取得的成就——铁路，蒸汽船，电报，电话，摩擦打火，电灯，照相术，留声机，X射线，光谱仪，消毒剂和麻醉剂的应用。在这份发展的实用清单之上，我们还应该加上另一份清单：能量守恒定律，光速的测量和地球旋转的实验证明，气体的分子论，废物利用的发现，对流星和彗星的研究，化学领域的定比和复比理论，冰河时代的证明，与《圣经》相悖的人类祖先的发现和证明，有机进化论，发生学中的细胞论和重演说，白血球的发现。

(图2)

无疑，上述成就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方向和性质。我们能将这种改变视为关于20世纪人类幸福的神圣许诺吗？要想回答这个问题，较之于对科学技术成果的清点，一份19世纪思想遗产的清单显然是必不可少的。而在这份清单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的商品和货币分析以及尼采的伦理学分析，两者对人类思想和践行的持续影响在整个20世纪清晰可辨。将我们为20世纪所开的思想清单——这份清单上有弗洛伊德的“力比多”分析，葛兰西的意识形态分析，本雅明的巴黎研究，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分析，福柯的权力分析，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分析，德里达的词语分析，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詹姆斯的晚期资本主义研究——与马克思和尼采的思想遗产并列起来，也许能为我们对20世纪人类生存境况的百年追问提供一些精神

性的线索。

但是，要想使追问变得有效、切合实际，就必须从理论领域回到日常生活，从精神层面回到物质层面。我们说20世纪具有追求高效率、高速度、高发展的特征，这一特征主要是围绕物质现实形成的。或许我们应该仿效一百年前的华莱士，为20世纪开列一份科技发明和物质文明的清单。问题是列入这份清单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这里只能挂一漏万地加以列举：超音速飞机，汽车，电视，电影，传真机，复印机，人工智能，电脑，激光，动物克隆，光纤传输，人造卫星，宇宙飞船。所有这些值得夸耀的成就，其内部都凝聚着20世纪特有的效率和速度。

(图3)

效率在20世纪的政治生活中意味着什么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恐怕只能是众说纷纭的。美国是20世纪公认最有效率的国家，但对于美国式的效率是靠什么来凝聚的，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美式效率来自民主体制中的政治权威，有人则认为它来自美国政治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由梭罗提出的不合作主义——不合作意识乃是基于天赋人权至上的认识，在美国，它可以追溯到以加尔文教义为核心的清教主义信仰和以约翰·洛克思想为主旨的自由主义精神。至于美国的法制体系，不少人把它看做现代效率的同义词，但堪称“世纪大审判”的辛普森案例对此显然是个莫大的讽刺。

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随着19世纪皇权统治和殖民地统治的终结，政治在20世纪日益成为一种划界行为，人们不仅用政治来促进自身的利



图3

1908年7月，中国上海至南京的沪宁铁路全线竣工，当年运送旅客323万人次。

1969年7月21日，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走下“阿波罗11号”飞船，登陆月球。他的那句话成为历史性的名言：这是我的一小步、全人类的一大步。按美国政府规定，阿姆斯特朗必须宣布，他的脚步所及都是美国领土。但当他站在月球上时，却突然改口说：月球属于全人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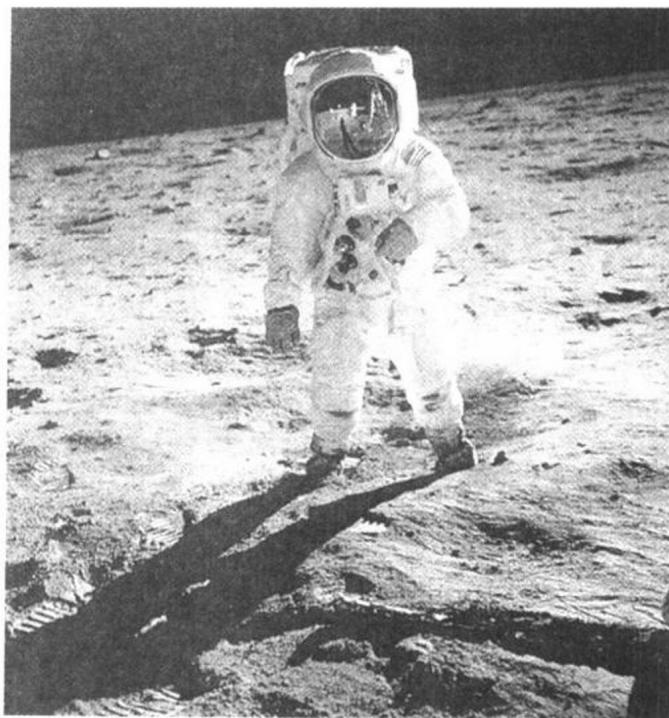


图 4

益，而且用它来界定自己的认同。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认同是由战时敌我阵营划分的；在“冷战”时代，政治认同则主要是意识形态对立的产物。“认同”实际上是依据“反对”加以界定的。换句话说，20世纪的人是用“我们不是谁”、“我们反对谁”来定义“我们是谁”的。这显然是对人类事务的一种简化，但据此形成的对抗模式影响至深，现代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政治对抗激发出来的。对抗有助于增强国家的政治内聚力，有助于国家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成长以及科技的进步。纵观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发达国家在交通、通讯、电子工业、核工业、航天工业、能源开发、医学研究等领域的深度探索和高速发展，以及由此汇聚而成的科技进步的方向和幅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政治决策和国家投资。在美国，国防部和宇航局是委托科研任务的最大的两个部门。至于苏联，几乎整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都是被军事工业的强势发展带动起来的。

(图4)

“冷战”结束后，人类进入了全球化时代，政治认同的依据似乎也变得

扑朔迷离了——有人认为惟一的依据是普世主义，有人认为认同只能是民族身份的认同或地缘政治的认同，还有人认为应该经由文明板块的重新划分来界定自身的认同。但无论对认同作出怎样的政治界定，在全球化时代，那种由意识形态对抗和军事对抗所支撑的旧式政治都已成陈迹。由于政治与经济融为一体，国家活动转而以解决技术问题、消除功能失调、保障经济体制的稳定、促进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导向。政治效率在当今的定义是：更多人参与的、更高透明度的决策过程，以及更为合理、更为公平的资源分配。越来越多的政治人物意识到，与其奢谈华而不实的大道理，不如关注某些切合实际的问题。比如，如何满足扩大决策参与范围这样一种全球性的要求，如何对待在跨国资本增长过程和现代知识创造过程中引发出来的历史性分化问题，如何避免在富人与穷人、有知者与无知者之间制造一个鸿沟。

（图5）

效率意味着经济活动中的挑战、活力、商机、市场、利润。在20世纪，工艺技术和生产形态的变迁影响了传统社会结构。科学发现的实际应用结合新的经济组织形态，全面启动了技术进步与经济成长的循环，现代化乃是这一过程持续循环的结果。现代化对任何事物的惟一价值尺度就是“效率”，它强调工具理性，强调功利性的成果。它是这样一种尺度：它刚好能测量出从作为一个梦想的财富到作为一种现实的财富之间的距离。

经济活动并非我们所认定的那么了无生趣。只要效率和速度在其中起作



图 5

1999年3月，纽约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价格几度突破万点大关，创历史新高纪录。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其中含大量泡沫成分，将有大的跌幅。一年之后的2000年，到4月20日止，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7.15%。



图 6

20世纪末的手表广告，到了20世纪后半叶，人们对时间的认识比世纪初更深刻更真切，分秒必争。这款手表除了传统的时分设计之外，还配以单独秒表以及两个不同时区的时间显示，方便手表的主人分辨另一地的上午、下午。

用，经济就会从它的灰色变出我们所需要的任何一种颜色。金钱是什么颜色呢？华莱士·史蒂文斯，这位专以写虚构性质的诗歌为乐事的美国现代派诗人，曾在晚年的一则诗学笔记中写下了这么一句话：“金钱是一种诗歌。”它肯定会使某些去过深圳的人联想起80年代写在深圳街头广告牌上的著名广告词：

效率是生命，时间是金钱。

(图 6)

对此，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在他们看来，质量才是生命。但无论如何，效率已静悄悄地在20世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形成了生命：效率有它自己的脉搏、心跳、呼吸和神经。效率没眼睛但在注视，没耳朵但在聆听，没手但能与人相握，没腿但能到处行走或奔跑。哪儿的产业、市场和货币富有生命力，哪儿就有效率的血液循环。哪儿的经济在起飞，效率就在哪儿展开了翅膀。

效率——20世纪最不可思议的一个世界性神话。

效率神话首先是速度神话。它凝结在日常事物、符号、各种统计数字的深处，对人类的生存施加影响。我们可以将速度神话看做一种程序，其开关只有一个字：快。快的程序一旦启动，生活似乎就再也慢不下来了。什么都是快的——快餐，快照，快报，快件，快艇，特快列车，邮政快递，相机快门。打球要打快球，赌马要赌快马。产品更新换代

快，市场像风向那样倏忽万变——比如中国的VCD市场，去年还春风得意，今年却已是秋风萧瑟。钱挣得快，花得也快。升值快，贬值快，流通快。富日子穷日子都是快的。娱乐是快的，时尚是快的，知识是快的。386之后是486，586。奔腾Ⅲ够快了吧，等着瞧，奔腾Ⅳ更快。要出门的话，上哪儿都有车可乘，打的也好，搭公共汽车、乘地铁也好，反正轮子都照样快。车子的零配件，方向盘，石油，噪音，废气，红绿灯，加速器，计费器，交通事故，所有这些全都汇集到轮子的快上来了——这快，“旋转又旋转着更大的圈子”，它已没了中心，失去了控制。甚至死亡也是快的，车祸使它的到来变得猝不及防。如果车挂在五挡上，其速度也许正好符合20世纪对死亡的看法，刹车是刹不住的。空难就更不用提了。散步的悠闲乐趣和缓慢节奏似乎成为了一种记忆。

(图7)

近年来，全球化进程中的“东亚速度”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在东亚，建设开发之快，经济增长之快，花样翻新之快，令人神迷目眩。这里的潜台词是：尽快往前走，千万别慢下来，否则就

图7



这世界，怎一个“快”字了得。

图8



时装工业将美丽提前预订。

会被时代无情地抛弃。这世界，怎一个“快”字了得。但实际上这“快”对现实来说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它只能说是对现实的一种百变金刚式的塑造。方便面和易拉罐使我们的吃喝变快了、时装工业将美提前一个季度预订一空、短暂的风靡一时的美，哪来那么多的时间让人把一件衣服穿旧？影视工业使梦想的兑现变得像取消一样快。不消说信息和新闻的快了，“本地报纸还没有印出来，有人已在别处读到了它”。男欢女爱当然也注定是快的，“快”乐嘛，庸俗小说把“情”呀“爱”的用流水作业的速度写了出来，刚读到一半，生活中的爱情就耗尽了——这一百来页厚的、用一个晚上就能翻过去的爱情。流行歌曲则在几分钟内把剩下不多的旧情唱没了，“还来不及卡拉，就已经OK了”。

(图8)

在白天，在公司、太多的压力和近乎疯狂的节奏使工作成了“狗日的工作”，每个人都在替“效率”这个老板打工。在欧洲人眼里，像日本这样的东亚国家已经成了一个股份公司，日本人连私生活都公司化了。中国呢？俄国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传记中有这样一个片段：有一天茨维塔耶娃在巴黎某商店排队购

物，排在她前面的一个法国人对一个动作稍稍有点慢的中国人极不耐烦。茨维塔耶娃就对那法国人说：“他是个中国人，他有点慢。”这话说得颇为传神。中国是一个多么古老、多么缓慢的国家，慢了这么多个世纪，但20世纪末也突然一切都快了起来。表面上这“快”是由物质世界的高效率和高速度带动起来的，但在物的后面其实潜藏着“快”的精神症候。早在50年代中国人就提出过“一天等于二十年”。问题在于，非得那么快不可吗？生命中某些真正珍贵的东西效率可能并不高，速度也并不快，就像是青草静静地生长，不能用分钟和小时去丈量。然而，当代生活就像是一只上了发条的橘子，现实的神经纤维被效率的发条拧了又拧，到处是时间加速度的滴答声。生活的各种碎片在读秒声中快速切换，生活在别处：出租车上，地铁上，飞机上，电话上，电视直播上，电脑网络上，电梯上。当高速电梯以子弹出膛般的速度把我们送到摩天大楼的顶层时，我们恐怕已是领悟不到李白诗篇中的那份萧瑟古意了——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效率神话造就了20世纪的时间神话。对高效率、高速度、高发展的无止境的追求，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念。现代人永远那么一副急急匆匆、随波逐流的样子，为效率所驱使的时间步伐怎么也停不下来。事情全都迫在眉睫，时间老是不够用。人们为节省时间而发明了汽车、飞机、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网络系统、速食食品，但效率却赋予时间以一种魔法般的性质：它越是省得多，就越少。省下来的时间都到哪儿去了呢？尽管我们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我们能为时间本身开一个银行户头，把省下的时间往那上面存吗？

有人将麦当劳快餐连锁店的广泛成功，看做是美国人雷依·克罗克对20世纪时间神话的一次有效破译。1954年的某

一天，这位搅拌器推销员第一次到加州麦氏兄弟快餐店推销产品时，就被其热火朝天的销售场面给惊呆了。“我像现代的牛顿，被土豆砸了脑袋”——事后他说。第二天他决定不再干推销工作，先是替麦氏兄弟开新餐馆，接着又在1961年以270万美元从麦氏兄弟手中购得产权。1963年，第500家麦当劳店开业之日，克罗克又适时推出了作为快餐文化形象的“麦当劳大叔”。1965年的一项调查表明，这一形象为全美96%的儿童所熟悉。被苹果砸了头的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被土豆砸了头的克罗克则创造了“全球口味”。克罗克的成功从表面看是食品口味上的，但往深处看，成功后面是他对20世纪时间效率的独特理解。他深知在美国人的时间表上几乎没有吃（尤其是午餐）的位置，吃已由旧时代的那种从容、那种排场、那种老派享受，转化为新时代的实用的、功能性的行为——其性质类似于充电、上发条，占用的时间当然是越少越划算。薯条、汉堡包、奶昔，克罗克把它们推上了生产线。这里面除了对时间因素的考虑，还包含了一个堪称经典的麦当劳式信条：旧式餐馆是顾客想吃什么它就做什么，麦当劳店则是它做什么顾客吃什么。美国《时代周刊》最近评选出20世纪20名商业天才，克罗克作为麦当劳的创建人跻身其中。《时代周刊》给他的评语是：“麦当劳所以成为一个企业，不过是因为一名52岁的搅拌器推销员明白我们如今不再吃饭——我们只是吞咽和四处奔走。”

（图9）

图9



麦当劳重新为饮食定义。